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20年散文:

用写作追问世界

□韩小蕙

我到现在都还在犹豫,要不要对2020年的散文创作放宽一些尺度?因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庚子年里,世界各地乃至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动物、植物、风、云、雨、雷、电、雪……所有的一切,都遭到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伤害!这情景,怎能让一位位作家和写作者,闭上双眼,捂住耳朵,一心一意地关在房子里写散文、搞纯文学创作呢?

所以,2020年的散文,认真地清点下来,真没有像2019年的《走进敕勒川》那样直击我心的大作品。

一

但是我当然一点儿也不否定大家都在顽韧地努力。不仅如此,还非常感动于作家们(包括新闻记者们)的勇敢奉献精神,大疫面前,生死考验面前,他们紧跟在医务人员队伍的后面,奔赴第一线。很多人都是自觉自愿去的,原因无他,只是觉得对社会有着这份责任,应该去为医学天使和战斗在疫区的人民群众鼓劲,并为这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作出记录。多年的练就,已使中国作家们形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凡有重大社会和重大事件发生,哪怕是泰山崩于前,他们也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这种责任感已经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20年的抗疫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既及时又很正能量,同时还很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作品,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这些作品不仅快速描写出全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波澜壮阔的景象,上至各级医院、方舱医院,中至医生、护士、清洁工、司机、快递小哥……下至“组织起来”的全体中国人民,在遍布城市、乡村乃至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山区,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也细微地表达出中国人民在这场大战役中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从最初的茫然、恐惧、紧张、害怕、悲观,到充满勇气、智慧、团结、乐观,互相鼓励,建立必胜信心,有些作品还深入到理性思考的领域,重读中外关于瘟疫和灾难的作品,反思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思考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国家关系和人类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因为单篇作品太多,此处恕不一一列举,但我必须点赞几本刊物:一是《美文》,贾平凹主编亲自策划和组织了“共同战役专刊”,贾平凹、肖云儒、熊召政、迟子建、冯艺、邵丽、关仁山、刘汉俊……这些作家都写来了文章,《美文》以相当于每期三倍的超厚篇幅,表达了中国文学界战胜疫情的心理信心;二是《天涯》推出了“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文学特刊”,韩少功、刘大先、王威廉、泮伟江等四位作家学者,对聚集、安全性焦虑、数字社会、生存结构、偶然偏离状态等疫情期间产生的新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其文章既有温度也有问题意识,并提供了应对新问题的新思路;三是《民族文学》杂志,从第3期至第11期,连续9期推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辑”,刊登了土家族、苗族、白族、仡佬族、满族、维吾尔族等作家的抗疫散文和其他体裁作品,让我们通过这些带着各民族体温的文字,看到了全国各地、遍布城乡的各族人民,在大疫面前团结起来,共同守护家园的努力,令人感动!

二

也许是危难当前,使人们更加重视起了亲情的可贵,2020年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至爱亲朋的散文骤然增多。写父母的散文是最不好写的,尤其是中国的父母,一般都是父亲寡言、威严,是家里的顶梁柱,父爱如山;母亲则是每家的奠基石,干活儿最多,吃得最累,最为吃苦耐劳,为全家人而把自己压榨到最后一分……由于太多共性,也就太多雷同。不过2020年或许因为疫情下严峻的隔离状态,或许因为我自己的感情变得脆弱了,还或许因为亲情散文既多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我被其中多篇燃烧心灵,久久不能自已。

江子《母亲的爆米花》几乎就是写天下人的共同母亲,林海蓓《爸爸的背》则是天下父亲的缩影。陈丹的《父逝之伤》写出了一对父女虽历经苦难,然而坚持善良、清白、正义的初心一辈子没有变。高伟的《五月墓园独语》锥心刺血,怀念的是母亲教他认真不苟地工作、奉献他人地做人的中华品德。阿拉旦·卓尔的《父爱如山》写的是她文学意义上的“父亲”——评论家、作家阎纲,为了培养她这么一个牧羊女出身的裕固族女作家,多年来倾心地教导她读书,倾力地帮助她成长。冯秋子的《文学,是他心里捧出的阳光》依然在怀念和总结着岸,尽管这位优秀的散文家已经去世21年了,她还在苦苦思索他的日记,寻觅着岸的感性 with 理性,甚或真实到疼痛的心灵迹象。

尤其是一些熟悉的老友或认识的名字,当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节、细节呈现出我从未能想象出来的面貌时,那种震撼和感动是加倍的强烈——生活匆匆,生命匆匆,我们往往看惯了春花秋月四时更迭,而变得迟钝又漫不经心,轻慢了大量本

来应该珍视的瑰宝,对我们的父母是如此,对亲人、对朋友、对邻居乃至我们身边的保洁员大姐、维修工大哥、保安兄弟、快递小哥……都是如此。

在一个明朗而健康的社会里,人应该是第一位的,人的高贵心灵、人的美好品质、人的每一个微笑,包括我们自身的每一次振作、每一次祛魅、每一次战胜阴暗迎来光明,都是为生命增色的壮举,都是为世界增福的善缘,都应该善待、喝彩、鼓励、坚持。这就需要散文,这就需要文学。

三

古代有“深夜秉烛好读书”,2020年则有“锁门在家深思考”。往年的开会、聚谈、采访、上班、社交、娱乐,变成了独处、深思、阅读和写作,喧哗的热闹被静穆的慎独所取代,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发现,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思考并“追问”了起来。徐刚的《良渚文化:发现的历史》以寻找和挖掘良渚文化,去追问江南人脉和江南文化的形成。王剑冰的《石问》问的是东北营口的大石棚,在4000多年前,在没有电能和机械的原始时代,仅仅靠着人的自然力,是怎样以命相搏搭建起来的?徐风的《黄龙山》讲述了做壶大师顾景舟的轶事,诉说了一把壶背后的文化底蕴、手工艺、饮茶史、风俗史……同时发问,在长达600年的时光里,宜兴凭什么把紫砂艺术做到了世界的极致?

孔凡的《蛇之殇》以毒蛇喻恶人,追问蛇为什么会有毒?然后给出他自己的独思:“就人而言,生命内部积淀的仇恨太深,又得不到及时必需的宣泄,就会化为毒素沉积下来,储藏在脏腑里。当毒素郁积到一定数量,他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要么伤害自己,患一场恶病走人;要么伤害别人,干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来。仇恨源自于伤害,受到伤害又没有能力报复伸冤,也无从化解,仇恨就结下来了,存入增值的银行里,生出毒的利息来。一旦社会变故,革命的暴风骤雨来临,这些蛰伏的蛇人,就能获得喷洒毒素的狂欢的机会。”

吴佳骏的《五种孤独》分别以“风”“烟”“光”等章节,写留守儿童和儿童们逼仄、孤独的生活状况,追问为什么非得把农村老家抛在时代列车的后面?唐朝晖的《为什么步履迈得那么艰难》记述了藏族女作家央珍的心路历程和写作之旅,这句话本是央珍在一篇文章中的问句,唐文原封不动拿来做了标题,可以看出他的感同身受有多深。

周晓枫的《散文的时态》只有短短2900字,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她向散文创作的高地发起了革命性的冲锋。她隐约发现了迄今为止、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散文写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属于过去”。为此,她大胆喊出了“以正在进行时态写作”,“因为‘散文以正在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就不像过去那么四平八稳,可能出现意外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转。少了定数,多了变数;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悬念埋伏,动荡感和危机可以增加阅读吸引力;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非概括性的总结;并且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元、多样和多彩——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数学一样有着公式和标准答案,而是具有难以概括和归纳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尔是唯一的,过程,依然能有多重、多重、多变的解决方案”。

此外,差不多所有有所追求的作家,所有有深度的作品都在思考与追问。其实都是在追问我们人类的终极原点: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每个人应该怎样深入思考、勤奋工作、认真生活,努力过好自己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四

2020年写古典的数篇,溯流求源,抚昔思今,都是既有书卷气,又具当代性的锦绣文章。

神奇的是穆涛的《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这根“棍子”原来是“表”,也就是后来的“日晷”,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时间”由它开始了,然后才有了日、月、季、年,才有了春、夏、秋、冬和天、地,又有了二十四节气;再然后,“时间”的概念——完成,这根“棍子”又由“正时”变成“正事”,尧帝把它竖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其作用在于仰观天象转向向天问政、替天行道,进而俯察世道人心……光阴一寸一寸过去,炎黄子孙所创建的中华文明一寸一寸升高,由神奇升华为而神圣,而我们内心的崇高感也在一寸一寸地升高。

潘向黎的《流逝永恒,此刻亦永恒》从古诗词入手,歌吟当年千古名句留下的永恒,但也表明了对今天的信心,在“怀古伤心的同时,蕴含着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人生代谢异代同心,因此情怀不灭。”刘琼的《七月芙蓉生翠水》亦是以传统诗词为媒介,纵写历代文人对荷花的吟咏,盛着多少故事和载得动、载不动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陆春祥的《如鹤》

写的是袁枚,这位清代才子33岁辞官归隐,蛰居在他的随园里,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等鸿篇巨著,如仙鹤一样的人生,至今尚传来几声清唳的鹤鸣。此外,聂作平《击壤歌》中初民们的生死悲欢,阿壹《绥德之丘》对一代枭雄蒙括的追悟,韦力《寻找苏东坡》的心路历程,张瑞田对《康有为的洛阳行》的往事钩沉等篇,均值得细读。

五

还要说到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2020年集中读了一大批各族作家的散文、纪实、非虚构,篇文章都写得颇有特色,值得大书特书。

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很不了解这个群体,而且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漏,这是很遗憾的。如果你们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各族作家的作品,看到他们这些充满了天地大美的感性又高扬着人性光辉的作品,你们一定会震惊的。

龙章辉(侗族)《被割裂的故乡》是一道时代的思考题,以个人执著于祖辈“走出农村,做城里人”的愿望,终于跳出了农门;后来因为修高速路、祖屋拆迁,父亲也带领全家进了县城;但欣喜之后渐渐发现,故乡已永久长在基因里,是无法割裂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苦闷与彷徨,使他开始思索民族传统和伦理、道德、秩序等重要问题,而这,当然不仅是一个个人、一个家族的困惑。黄立康(纳西族)《风中的声音》似一首苍茫的古歌,从散落在云贵高原上河川中的雁鸣、象语、马嘶、虎吼,还是有谓降调的“风吹低的草原,纳西祖先出发的地方”等五种声音中,追寻着母族的足迹,他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审美,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勇气、力量和善意,以及他们的人性之美,正是这低沉浑厚的声音,导引着一代代纳西人从黑暗走向光明,更向未来挺进。绿窗(满族)《当归,当归》宛如一阙铁板歌,以断肠草、甘草、五味子、苍术、菟丝子、金银花、当归等一味味中药材为引子,把一个在疼痛中生长出来的中医家写得波澜壮阔,也把对中国医药的神圣崇拜表达得人情入理。

祁建青(土家族)的《炫舞青稞》仿佛是铺在田间的巨大地毯,作家着眼于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启动了丰繁绚丽的编织,从“玄鸟化玄女,玄女化青鸟,青鸟化青稞”,到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用的青稞酒;然后,一路直奔历史和现实,进入到现代大型景观农业,在审美级农区流连忘返,饱览着“雀鸟在麦梢上舞蹈,稞穗在飞行间比翼。从翠鸟到金雀,田野史上演由翡翠宝石到黄金金属的传奇转型,骨骼内身灵性蜕变的前世今生,有关古老神仙们的事迹掌故,灰线草蛇还在田里留着呢。”这一段金光灿灿的描写,简直又是一首美丽的诗,直叫普普通通的青稞舞动起腰肢,炫舞成金了。

田芳妮(土家族)《翻过年关》和刘青梅(土家族)《翻垭口》都是抗疫散文,两个土家族女作家,两个都在武汉工作,庚子春节前回老家过年。两个标题都用了“翻”字,前一个老家搬新屋、家里买了新汽车喜气洋洋接她归,却没回成;后一个刚刚到家,却突然接到疫情消息而自我隔离。此二“翻”,把武汉与山寨紧紧勾连起来,不仅展现出两地(扩而大之是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情景,更把各民族、各人群、各职业层、各年龄层人民的积极心态、坚韧不屈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努力活化成来,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写的虽然是抗疫散文,但却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借鉴了小说的叙事优长,又用散文的语言表达出来,流畅清新,好读耐读。另外两位土家族男作家李传锋的《武汉疫情亲历》悉心记述了武汉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的点点滴滴,带我们再回首,思考来路;徐晓华的《眺望灯火》以一名值勤民警的自叙,写出恩施小城全民抗疫的一角,表达出爱家乡、爱祖国、爱亲人、爱人民、爱生活的人性大爱。感谢这四位作家,让我记住了湖北的土家族,并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勇毅的精神力量。

其他出色的作品还有:王樵夫(满族)《额吉和她的黑马驹》,李贵明(傣族)《盐的味道》,何建安(哈尼族)《风过哀劳》,兰柳杰(瑶族)《开满鲜花的河流》,白金萍(蒙古族)《当歌声响起》,谢家贵(苗族)《军人与老人》,格致(满族)《五号鹤》,艾傑木诺(德昂族)《小镇之人》,蒲海燕(侗族)《雪峰山花瑶》,阿娜(达斡尔族)《纳文江盐记》,陆祥红(壮族)《石桥上缘》,马凤鸣(回族)《十月的油菜花》,韦晓明(苗族)《青山巍巍特高笋》,黄其龙(壮族)《蜜蜂飞来飞去》,朝颜(傣族)《樟树下,外婆家》,姚茂春(侗族)《河畔的盛宴》,李达伟(白族)《高黎贡》……“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除了“少数民族都是天然的诗人”这个语言优势之外,我认为,还是因为“虔诚”和“纯粹”,真正的文学必须是虔诚的信仰。真正纯粹的文学写作不带任何功利,只是生命的腾跃、热血的演绎、灵魂的倾诉,既是作家一个人的表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民族的心声。所

真正的文学必须是虔诚的信仰。真正纯粹的文学写作不带任何功利,只是生命的腾跃、热血的演绎、灵魂的倾诉,既是作家一个人的表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民族的心声。这种写作,不是用笔(电脑)写的,不是轻飘飘的率尔操觚,而必须用尽全身心的力气,有点像夸父,宁愿道渴而死。

六

以这种写作,不是用笔(电脑)写的,不是轻飘飘的率尔操觚,而必须用尽全身心的力气,有点像夸父,宁愿道渴而死。正如作家卓然所说:“如果只是为写而写,或只是技术性写作,那样的小说就永远只是所谓的小说,散文也永远只是文字意义上的散文,永远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六

我曾问过张中行老先生,对于文学(散文)创作来说,什么最重要?行公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五个字:“思想最重要”。这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穷其一生的所悟,真正是至理名言。对于我们很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来说,秉持的也正是这种文学观,所以今年最好的散文作品,我认为还是思想、胸襟、境界、学识、学术、艺术合而为一的作品。

鲍鹏山的《圣贤之忍》又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大文,不仅把“忍”字所包含的“忍受”“容忍”“残忍”“刻忍”一一讲了个彻底透明,而且也把君子与小人的关系讲得明白而透彻:“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尽管如此,一辈子穷困潦倒、忍饥挨饿、倍受挤压的君子们,也得守住底线,不能堕落,变成小人。而“坏人最大的危害不是伤害了好人,而是让好人变得跟他一样坏”,这句话更是警钟,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追求世界文明高度的人类来说,必须不断保持和增加好人的数量,压制和减少坏人的数量,否则社会大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糟。

贾平凹的《我与文学》太有启发性了,一组不长的小文章,篇篇都是他平时时生活和文学写作中切肤锥心的体悟,以平实得让人感到亲近的语言讲述出来,不做作、不摆架势,春风化雨,丝丝入心。比如:“自感新添了一种本事,能在人里找出哪一个是很变的,哪一个鬼托生,但不去说破。”“如果没有现成性就不要写了,尽力地去吸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写过那么多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试着来做撑篙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哪一个不是作家生命里的文字!”

韩少功的《聚集:有关的生活及价值观》借助于对人类在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面前的表现,直接批判了当代生活中的随波逐流者,如整日追逐高消费、追逐虚荣生活、追逐奢华等。是的,这么多年的怪怪陆离中,一些人的价值观确实出了问题,人类文明、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传统都被遗忘、被取代、被抛弃了,人生之路千回百转,确实是回过天来好好思考一下了。正如老舍所说:“虚荣终究是虚,华而不炫和好而不奢的传统生活观,总会在历史的坎坷途中不时苏醒。当生命、安全、智慧、自由、公平正义等更多价值选项摆在面前,一旦与虚荣发生冲突,很多人未必不会去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平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疫情终会过去,但疫情会留下,留下了伤痕和记忆,事情同以前就不再一样。地球人永远面临新的故事。”

七

站在“新的故事”即将到来的天际线上,回顾2020,犹有惊心动魄之感。这个灾难重重的庚子年,注定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生命中的一根极难忘的“棍子”,分分秒秒的轨迹中,苦难多于欢乐,有数千万人在病痛中挣扎,有数百万人永远闭上了眼睛,还有更多的人在战争、地震、台风、水灾、大火、蝗虫、饥饿、骚乱中受着煎熬!在这至暗时刻,请读李元胜的《春天花会开》,是的,从题目就能看出他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像他一样,保持乐观,保持坚强,保持顽韧,保持强大,精神抖擞地装备好自己,去大自然中迎接春天,在文学原野上寻花觅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作为刊发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中国作家》纪实版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刻,为发展繁荣新时代报告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2015年,国家正式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一场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征战”开始了。新时代全面脱贫,举国小康,是中华民族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中国作家》纪实版开设“中国故事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栏目,刊发了一批优秀脱贫攻坚主题作品。陈果的长篇纪实文学《古路之路》(第4期)讲述了四川汉源县古路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在脱贫攻坚的浩荡激流中绝地奋起,开拓了一条走向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融合的乡村旅游振兴之路。逢春阶、朵拉图的《家住黄河滩——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全景实录》(第8期)是对黄河滩区脱贫迁建的忠实全景记录。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施黄河滩区大迁建这一重大民生工程,承载着山东黄河滩区居民长久以来的“安居梦”“致富梦”,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瞬间,塑造出滩区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逐梦圆梦的文学影像,并在塑造基层干部的形象上作了可贵探索,是黄河滩区发展史诗般的鲜活档案。此外,还有林吟《大道尽处是桃源》(第2期),丁一鹤、毛永温《防贫诞生记》(第8期),武歆《天津到甘肃有多远》(第12期),胡正银《神绿》(第12期),赵天秀《和月坝一起成长》(第12期)等。这

■关注

抒写决胜之年 记录时代篇章

□佟鑫

些作品既有从微观层面对脱贫攻坚实践的细部观察,也有从宏观层面对脱贫攻坚的中国进行全景式多视角的摄取报告。

2019年9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举办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启动。参与这一创作工程的有20多位作家,《中国作家》也积极投入到这次活动中来,组织了吴克敬、徐剑、任林举、许晨、哲夫、王松、丁燕七位作家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创作出了《爱的礼物》(哲夫)、《出泥潭记》(任林举)、《山海阔东》(许晨)、《岭南万户皆春色——广东精准扶贫纪实》(丁燕)、《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徐剑)等一批深刻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精品长篇报告文学。其中,《爱的礼物》(第7期)以一个鲜活的人物、感人的故事、精准的数字生动反映了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脱贫攻坚全貌。《出泥潭记》(第9期)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在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展开充分的叙事,一方面再现“泥潭”之深和脱贫之难,另一方面也更突显脱贫攻坚工作者的坚韧、智慧和细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出泥潭记》是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等的新变记。《山海阔东》(第10期)以扎实的采访、感人的故事全面深入地追溯描绘福建省宁德地区30多年来持续努力和奋发脱贫的情形,作品全面深刻地再现了宁德

人民,在一届届党委、政府带领下,矢志不移砥砺前行奋斗历程。《岭南万户皆春色——广东精准扶贫纪实》(第11期)是一部反映广东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与成就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生动讲述了新时代中国扶贫攻坚故事。作者深入走访广东省连樟村等多个贫困地区,与当地贫困村民、扶贫书记亲切交流,以质朴真实的文字记录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贫困村民摘掉“穷帽子”,过上新生活的巨大变化。《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第12期)描写西藏脱贫攻坚的故事,其中不仅有全面全景的拍摄,更多的是“独特的、传奇的、鲜活的、抑或感动的故事”,而那些平民的故事,更像是四处弥漫着的青烟,充满了人间的真切感”。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史志的一种大写,这些报告文学礼赞在脱贫攻坚中形成的中国力量、中国创造和中国精神,富有表现力地塑造具有中国脊梁式的扶贫模范、脱贫强者,以全新的文学经验和有效的文字书写,丰富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的内存。

2020年举国上下奋力抗击疫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诸多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以笔为旗,投身文艺战疫的行列之中。为记录这场防疫阻击战中值得铭记的时刻,《中国作家》纪实版刊发了抗疫特辑李春雷《金银潭》、

李朝全《一心赴救无惧生死——同济医院战“疫”纪实》、纪红建《湖南行动》等15篇作品,并专门开设了“人间之抗击疫情”栏目,刊发了何建明《上海表情》,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以及人类与疫病斗争史上的又一英勇壮举,具有值得铭记的现实意义与显见的文献价值。刘诗伟、蔡家国的《生命之证——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采取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历史过程和画卷,让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过程有了全方位的认识,凸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信念,亦显出中国作家为社会留档、为历史存真、为民族铸魂、为人类问道的担当精神及写作初心。此外还有王威廉《严重的时刻——记王烁》等共计7部作品。

此外,《中国作家》纪实版还刊发了很多贴近生活,紧跟现实,追随时代脚步,讴歌党、国家、人民和英雄,与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命运、同国家齐进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如何建明《革命者》(第1期),曾平标《初心——粤港澳合作中的横琴故事》(第1期),李发锁《追梦之歌——记李国荣和她的团队》(第2期),高洪雷《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第3期),王敬东、朱向军《“华龙”腾飞》(第3期),陈果《古路之路》(第4期),傅宇军《心中的旗帜》(第6期)等。

报告文学文体的自立,不仅需要文体创作本身取得相应的实绩,而且也需要有理论伴行,提升以至优化。为此,《中国作家》纪实版针对重点优秀作品,多次开展研讨与文学批评,提高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